

秘密岁月

戴安娜私人医生回忆录

「英」西蒙·西芒斯
安允涛 曾鸣 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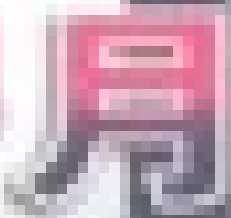
The Secret Years

Simone Simmons
With Susan Hill

Atlanti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秘史



秘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私人生活



The Secret Years

From Mao Zedong to Deng Xiaoping
The Private Live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DIANA

秘密岁月

戴安娜私人医生回忆录

[英] 西蒙·西芒斯 著
安允涛 曾鸣 译

The Secret Years

Simone Simmons With Susan Hill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1—507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岁月:戴安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西芒斯著;
安允涛,曾鸣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

书名原文:Diana the Secret Year

ISBN 7-5004-3265-8

I. 秘… II. ①西…②安…③曾… III. 戴安娜—生平事迹
IV. K835.61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908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李颖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河北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页 10

字 数 13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序	戴安娜之约 / 1
1	戴安娜的精神毒素 / 5
2	戴安娜在肯辛顿宫“跳大神” / 17
3	戴安娜离婚后的私人空间 / 38
4	戴安娜如何保护私生活 / 61
5	戴安娜应对新闻媒体 / 91
6	戴安娜与她的情人们 / 103
7	戴安娜的真爱无敌 / 125
8	戴安娜的乔装打扮术 / 142
9	戴安娜与家中三个男人的关系 / 156
10	戴安娜穿越雷区 / 182
跋	“女猎手”之死 / 198
附	我是一个“气场”治疗师 / 204

序 戴安娜之约

应戴安娜之约,我写下了这本书。

1997年2月的一天,戴安娜懒散地躺在肯辛顿宫她私人客厅的沙发上,而我早就坐在了地板上我习惯的舒适位置上,靠着壁炉前那个填充起来的大“河马”。她又讲述起自己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这让我们乐不可支,笑个不停。故事当然是真的,她亲口所述,非小报消息及白金汉宫的官方公告可比。然而当晚又有一个电视节目把事情全搞混了,戴安娜用纸巾轻拭了一下眼睛,笑着嘱托

我将来写本书，“告诉人们事情的原委”。

“人们会说我是古怪的王妃，你是古怪的通灵者”，她快活地告诫我，“但我想让你告诉世人真相，这只是时间问题”。

《每日邮报》的记者理查德·凯，她的另一位密友，在同我们一起观看纪录片。在影片中，戴安娜的侍从长保罗·巴若尔在白金汉宫做侍从。他穿着男仆制服，小腿的灵巧转动尤其让戴安娜忍俊不禁。但她从我们这儿得到事实真相的要求却向来是严格的。

戴安娜厌倦了别人的错误引用、理解和判断。那天下午的节目影射她反复无常，奢侈无度和乖张易怒，这让她觉得很有趣。先前她经常被这种报道激怒，但那时她已变得很坚强，有时可以一笑置之，并要我将来纠正她被歪曲的形象，为她澄清事实。她相信我可以讲述一个与众不同且更为真实的故事。当时我向她许下诺言，至今仍信守不变。

当时，从下午到晚上我们一直在说说笑笑，所以她的话并不像是请求，更不像是义务。但自戴安娜去世后，我的思绪又重回到那次谈话中去。生前她经常被误解，她的话也经常被误引，但那时她至少还能够按自己的方式把事情说清楚，现在只有真正爱她和了解她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毫无疑问，戴安娜是个坚强的年轻女子，但坚强者也会感受到痛苦，并且总是不可抑制地去反抗不公。戴安

娜也是个非常敏感的人，就像天空中飞翔的天鹅，高贵而脱俗，尽力淡漠对她来说尤其难以忍受的种种批评。对我而言，这就解释了我们独处时，她在欢笑和泪水之间排遣痛苦的能力——因为当她需要倾诉真实自我的时候，她可信赖的朋友寥寥无几。她不得已成了专门的伪君子、撒谎者和事情真相的篡改者。她有许多面具，我想有时抛掉它们对她是一种解脱。

那时我们已成为朋友，即便如此或正因如此，我有时必须对她直率一些，这可能导致我们之间出现短暂的摩擦，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点点滴滴，她相信我会说出事情的真相，不会因任何人的威胁而后退。她知道在我眼里，她是位年轻快乐的女性，热爱生活、异性、美食和娱乐，绝非人们经常描述的忧郁、孤独而又神经过敏的可怜虫。她也知道人们低估了她的智慧，却又毫无根据地高估了她对自我的迷恋。实际上，当媒体把她描述成皇室和当权派中“不受约束的大炮”时，她认为这相对而言已是溢美之词了。戴安娜或许还没有成长为她心目中注定要成为的女人，但她想让世人知道她已重新振作起来，这是她的独立和意志胜利的表现。她想让我澄清事实真相。

有时候我发现她恼怒地躺在小客厅的沙发上，一张街头小报散落在她的脚旁。甚至报道中关于她公共生活或私生活的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会使她暴怒或者心情沮丧。

她知道就自己的位置而言，她应对这样的关注表现

出超脱的姿态,然而她需要澄清事实。即使报道中大胆的披露属实,她仍希望告诉人们对她自己事实的解释。但这怎会同她对隐私的需要相一致呢?享有特权的新闻记者们接到她的电话自然高兴,他们要么会写出纠正谬误的报道,要么会提供误导读者的信息。可戴安娜知道经常这样做会导致相互竞争的报纸记者间的不和。她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会更加煽动起一些负面的谣言——攻击她意图操纵民众,有自怜心理,利用电话进行侵犯性行为。尽管极度渴望表达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使真相为人所知,她痛苦地意识到只要自己试图干预,更多的流言蜚语会接踵而至。

我所能做的就是倾听,然后尽一个朋友的责任向她提出建议。我非常清楚,正是我的背景使我恰如其分地成为戴安娜的朋友。不管我们缘何相识,当她在肯辛顿宫向我倾诉她的沮丧时,所有的不快都已成为过去。我们的经历同《火车上的陌生人》并不太相似,因为那时我们彼此熟知。但我意识到正是由于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是如此迥异,戴安娜有时向我诉说起来才更为从容自如。

1 戴安娜的精神毒素

观看威尔士亲王和戴安娜·斯宾塞女勋爵二人的婚礼大典时,我刚在伦敦一家诊所做完小型的外科手术,处于药物麻醉和疼痛的状态。那天看到她时,我就感觉到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已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并会在将来某个时间证实这种联系。这种预感没有丝毫的逻辑,后来我把它归结为药物对自己头脑的影响。事实是,在婚礼之前,我对戴安娜并没有多少兴趣,突发的这种想法也不是为了哗取众人的注意。直到今天,我仍不能明白为

什么我会感到这种必然,但有些顿悟是无法进行分析的。然而数年之后,当我与戴安娜已彼此熟识时,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前生可能曾是表姐妹、姐妹,甚至可能是母女。这好像是能够解释我们之间深层关系的惟一方式。

同大多数人一样,在1981年7月那个独一无二的日子里,我单纯地认为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勋爵的婚姻就像皇家剧院里的乐章一样辉煌。我祝福他们美满幸福,分享世界对他们所持的浪漫乐观的态度,然后回到料理自己生活的现实中来。

16年后,1997年8月31日的凌晨时分,我还在家里沉睡。睡意朦胧中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告诉了我发生在巴黎的车祸,我随即打开了电视。让人吃惊的是,现在我已记不起当时是谁打来的电话,尽管我确实记得我的小外甥随后打来电话,问我是否需要他过来一下。我还记得我想尽快与新闻记者理查德·凯联系,他是王妃和我共同的挚友。

她去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几乎失缺了记忆。我生命的活力终止了,感情也被冻结了。与举国上下,乃至整个世界对戴安娜潮水般的哀悼相比,这或许显得有些冷清,然而我们的震惊和痛苦却是毫无二致的。成千上万素昧平生的人们为她的非凡魅力和内在美德所打动,前往送花或在哀悼书上签名,表达他们真切而发自内心的悲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不尽相同了。

我并不是说戴安娜的死亡对于我们这些真正了解她

的人影响更重大,而是说由于私人关系的缘故,那悲哀来得异乎寻常地强烈。现在我回顾起我们之间的友谊,眼前总会闪现出王妃那性格丰富、善解人意,虽有时任性却总是充满人情味的形象。我庆幸自己能拥有这些记忆。当你真正关心的人离开人世,你经常会有一种事业未竟的挫折感。没有一天我不想完成我们曾被打断的谈话,没有一天我不想与她一同分享轶闻趣事,或者仅仅给她一个拥抱。我不得不劝慰自己:友情总是开始于一次正式的握手,爱却永远不会随着灵柩被埋葬。

尽管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的友谊随着她结婚当天我的预感就已经开始了。一个月之后,另外一件事情对我产生了更为深刻直接的影响。这场家庭危机不可避免地,也许是命中注定地把我拉向了戴安娜。

1981年8月,我在医院里看到一缕彩虹的光辉从我19岁的妹妹雷切尔身上散发出来。她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数天以前她由于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严重受伤而住院。尽管她的昏迷状态还要持续几个月,但我发现我此刻能够与她交流。我开始问自己,我曾一度凭模糊的直觉感受到的治愈病人的天赋是否真的存在。在无数次的探访中,我发现如果我把手放在雷切尔旁边,而不是身上,然后集中精力轻轻地说些关心和鼓励的话,检测她心脏的仪器上的指针便会轻快地振动并跳起。凭直觉我好像感觉到她的气场和灵魂在肉体上方流动,并且在某种程度

上我知道我能帮助雷切尔把这两种力量拉到一起。后来,我得知听觉是感官中最强的,无论一个人处于何种昏迷状态,它似乎还能持续地发挥作用。当时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我在这方面的天分,当然也不能肯定我会成为真正的治疗师,然而我与病人膏肓的妹妹的联系毫无疑问塑造了我。

事实上,我的余生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雷切尔,她的幸存迫使我面对自己的能力:我不能再把这些设想成意外、巧合或者是不能继续开发的、微不足道的才能。不要误解我,雷切尔的复原应归功于她所接受的悉心照料。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当医院已对她丧失信心的时候,我却坚信通过爱的方式,她的大部分生命会得救。俗话说“生命可以借希望得以维持”,这里面蕴藏着绝对的真理。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雷切尔先我之前很久就曾遇见过戴安娜。当时年轻的威尔士王妃视察了诺坦普斯顿郡医院。雷切尔在那儿刚刚度过了她漫长恢复期中的关键阶段,她重新学会的最初几个词很有可能就是对戴安娜说的。

对从事专业“信念治疗”这一非传统职业来说,我的背景既不能给我作出指引,更不能为我提供任何预备性的训练。我们一家居住在伦敦北部市郊的一所大房子里。我的父亲哈罗德是一名成功的衣服制造商,他在伦敦东区有一个工厂。在他尚未承担家庭和工作责任之前,他曾与罗尼·斯科特和他在爵士乐俱乐部的乐队一起

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时不时他还会回顾起早年的狂野不羁和不守陈规。我的母亲弗朗西丝不仅美丽，而且像父亲一样具有艺术天赋和诗人气质。因此，我想我可能继承了他们许多天分和不计后果的天性。但作为一个家庭而言，我们远不是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生活对于我们姐妹三人来说非常有序，我少年时代的叛逆非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受到了遏制。

许多十几岁的女孩子着迷般地读着她们的占星图，但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太沉闷了。我上学时最好的朋友朱莉亚对手相术颇感兴趣，而我则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先知。大约 14 岁时，我们组成了一个神秘团体并在《犹太编年史》上为征召成员刊登了一则广告。我的父母对此觉得很有趣，并持一种超然的宽容态度：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嘲笑或警告过。聚会就在朱莉亚父母的房子附近举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天真无邪，主要源于对未来的遐想。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对此极为着迷，并且在 17 岁时加入了大不列颠灵魂论者协会。

我毕业后不得不找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我做的时间很短，是在一家服装设计店做工。那里的推销员对女士们阿谀奉承，好让她们不明智地购买价格昂贵的衣服，从而抽取更多的佣金。而我总是告诉顾客他们喜欢的套装根本就不适合他们，这样两三天之后，我就被解雇了。后来我想尝试着做秘书，理由是既然我会弹钢琴，打字对我来说也应是轻而易举的事。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愉快

地为一个儿童慈善机构工作了一年,虽然周薪只有 10 英镑,而且我花了些时间才明白如何使用打字机滑架和复写本。此后我又做了些别的办公室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在父亲的老街道工厂做胖夫人装,在那儿我学到了许多时装生意的知识。尽管是老板的女儿,我并没有得到任何优待,也得像女佣那样去工作,但我确实很喜欢这份工作。实际上,我相信那时我能够在那一片天地里干一番事业。当我从著名的设计师波莉·派克那里获得一份时装绘图师的工作时,我手上的肌腱被拉伤了,不得不动手术并接受三个月的物理治疗。等我能够绘图的时候,工作已转交给了别人。这份工作本可以充分发挥我受挫的艺术天赋,并向人们展示我新学的技术。

客观环境的变化把我带到了从事治疗工作的位置上。在我恢复之后,我开始在汉普斯顿的皇家免费医院——我曾接受过治疗的地方——做一名临时秘书。起初我只是做给 X 光卡归档的简单工作,后来我学会了 X 光摄影法,并成为一位内分泌学专家的得力医学秘书。这时,我开始感到自己像一名受挫的医生,尤其是当时我广泛地阅读了有关人体经络对人的影响的资料,了解到复杂的经络系统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生理和精神健康。但是我并没有认真考虑投入到正规的医学训练中去,因为那时我已非常倾向于选择性疗法,这要归因于我和雷切尔的经历以及一个好朋友的影响。七八年过去了,尽管雷切尔在短时记忆上有些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可能在

以后的岁月中还要困扰她,但我已亲眼目睹了她较之以前的巨大好转。我确定自己默默地祝她康复的意愿起了作用,并试着充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为朋友们提供一些私下的建议。

命运多舛,1990年,我在一个超市被洒在地上的牛奶滑倒,摔伤了尾骨。神秘而又深刻的转变不常发生,那一次却成为了事实。历经长期的疼痛和令人头脑麻木的文牍工作、法律求助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我获得了一些经济赔偿,然而与此同时,我也被迫辞去了所从事的全职工作。恰巧关于我有治疗能力的话被传开来,这样我可以通过在家为人看病来维持生活。这时,我尤其感兴趣的是研究当事人的气场,围绕在人体周围的非凡的彩色波纹,其颜色会随人的心情和健康状况而改变。这些气场几乎等同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示意图(关于对我的一些治疗方法以及戴安娜对成为一名治疗师的兴趣的介绍,请参看附录部分)。

仅仅是在几十年以前,许多人还难以接受生理和情绪化学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学说。然而当今,大多数人明白了尽管这种事情从逻辑上总是不能给予解释,但是他们的直觉和本能经常是正确的,尽管这似乎非常神秘。我的确对每个人的气场都有敏锐的了解,因此我能知道他们所面临的气场状况如何且缘何有害或有益。这种了解奠定了我部分工作的基础,而我精湛的治疗技术便是为那些身处困境的人排解压力,并提供治疗。

因此,从1990年那次意外事故之后,我便开始从事兼职治疗师工作。当然,我承受了来自传统医疗界的批评和非议,有时这让我感到了伤害,但我对自己的工作和成果有信心,因此我就接着进行下去。我有时并不收费。如果我觉得病人会因担心费用的问题而遭受更大的压力,从而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就会放弃收费。

我与戴安娜的联系始于1993年,这是她恰好对选择性疗法格外感兴趣的结果。我很少遇见有人像她那样迫切需要生理和情绪的调养和治疗。

她对我的信任源于她确信我和她的其他朋友决不是同一个社会圈子里的人。我决不会口无遮拦地向人们透露一些与她繁忙的日程安排不同的消息。我逐步认识到戴安娜是一个了不起的划分者,她为我在她生活中划分出精确的空间,很少有其他人可以进入。这并没有冒犯我,实际上它正适合我,因为我并不希望成为她社交生活的一部分;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会使她能够以更大的信心来应付她生活中的黑暗面。

我认为,在她的少年甚至青年时代时,她都没有一个爱她、接受她并理解她的朋友圈。后来,当她成为威尔士王妃时,又有那么多人有求于她,设法引起她的注意,对她奉承献媚,所以她结识真正朋友的机会更少了。我相信这就是她和我产生共鸣,逐渐建立信任,后来又成为朋友的原因。我比她大几岁,且来自一个郊区的犹太族家庭,这几乎不能与她拥有特权的贵族身份相比。但这并